

科举评价中的社会归因偏差与矫正

李雄鹰

摘 要 :自科举制度创立以来,对科举制度的评价褒贬不一,此局面从科举制度实施的科举时代一直延续到科举制度废止后的后科举时代。从社会归因偏差理论视角,存在于科举评价中的刻板效应、错觉关联、晕轮效应是导致将科举制度“妖魔化”的深层原因。分析三个效应在科举评价中的表现及影响,从文化自觉、加强科举研究及增强科举信息传播角度切入是矫正科举评价中归因偏差的根本举措。

关键词 :科举评价 ;社会归因 ;偏差 ;矫正

自科举制度创立以来,历代对于科举制度的评价褒贬不一,尤其是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中,围绕科举考试内容、方法改革及科举制存废等问题,曾出现长期而激烈的论争。虽然 1905 年科举制度被迫废止,但对于科举制度的评价并未“盖棺定论”,关于科举制度的评价争议一直延续至今。^[1]原本科举评价是见仁见智之事,众人皆可评说一二,但针对科举制度的一些极端性观点和歪曲事实的假想性判断与联系则将科举制度“妖魔化”,不利于人们客观公正地认识科举制度曾经对中国古代社会及世界考试制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并与当今各类考试制度密切相关的事实。从社会归因偏差理论视角,有助于从深层次揭示科举评价中“妖魔化”观点产生的原因,并有助于探寻矫正不当评价观点的策略。

一、科举评价与社会归因偏差理论概述

“评价”一词早在 900 多年前我国北宋时期就已出现。《宋史·戚同文传》中就有“市物不评价,市人知而不欺”的记载。《辞海》对“评价”的解释是“评价,评论货物的价格,今亦泛指衡量人物或事物的价

值。”^[2]从一般意义上,评价是指根据某种价值观对事物及其属性进行判断与衡量,对人或物做出好与坏、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优与劣的判断。评价是人的认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的认知活动有重要影响,评价时时发生,有主动与被动、有意与无意之分。评价有其应遵循的程序、要求与准则,理论上根据这些要求评价事物就会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但由于评价活动受目的、时空、评价主体、评价对象、价值观、信息、情绪情感等众多因素影响,尤其是在复杂环境下也不一定总是理性的,因此也不一定总是按照规范程序与准则认识事物,而是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和错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扭曲事实真相的行为。

科举评价是人们基于科举制度认识基础上的对科举制度的价值判断。科举评价的主体主要包括学者和社会大众,评价内容则囊括了科举的各种具体制度与程式、科举人物、考试内容、科举文物以及科举与相关事物的关系等。按照时空可将科举评价分为科举时代与后科举时代的评价;评价观点则可大体分为平反观、批判观、观望观,根据评价的深度可

作者简介:李雄鹰,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兰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考试研究(厦门 361005)

分为专业评价与一般性评价。科举评价作为一种社会认知活动,当不同主体在不同情形下去认识它,也必然会出现偏差,我们称之为科举评价中的社会归因偏差。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归因偏差理论比较系统、深入地揭示了个体社会认知行为中归因的种种表现及出现偏差的原因,借助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科举评价中一些评价观点产生的深层原因。

二、社会归因偏差理论及其在科举评价中的表现与影响

社会归因偏差指的是认知者系统地歪曲了某些本来是正确的信息,有的源于人类认知过程本身固有的局限,有的则是由于人们不同的动机造成的。经典的归因理论模式将普通人看作是理性的、讲究逻辑的,就像科学家一样,人们在对事物归因时,会客观地评价与利用各种信息。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可以预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们作出的归因都将是符合实际的、无偏的,而且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所作出的归因将会是一致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归因有时是错误的、有偏差的。归因的结果对人的后续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正确的归因有助于提高人的行为的积极性并产生对自己及他人的有利的、合理的行为,错误的归因则会造成行为动机的削弱,导致异常行为的产生。实际生活中,人们对自己及他人的错误归因是经常发生的,由于主观上的原因而造成的归因偏向和差别,是不当归因的主要形成原因。在社会归因理论中,常见的社会归因偏差主要有刻板效应、错觉关联、晕轮效应等。

1. 刻板效应。又称定型效应,是指人们用刻印在自己头脑中的关于某人、某事的固定印象,并以此固定印象作为判断和评价依据的心理现象。有些人总是习惯于把人进行机械的归类,把某个具体的人看作是某类人的典型代表,把对某类人的评价视为对某个人的评价,因而影响正确的判断。刻板印象常常是一种偏见,人们不仅对接触过的人会产生刻板印象,还会根据一些不是十分真实的间接资料对未接触过的人或事产生刻板印象,例如老年人是保守的,年轻人是爱冲动的,北方人是豪爽的,南方人是善于经商的,英国人是保守的,美国人是热情的,

等等。刻板效应具有如下特点:对个体、群体过于简单化的分类;在同一社会、同一群体中,刻板印象有惊人的一致性;多是偏见,甚至完全错误。社会刻板效应是经过两个途径形成的:一是直接与某人、某事物接触,将其特点固定化;二是由他人间接信息影响形成。间接的信息影响是刻板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如要克服刻板效应,具体方法是:首先要善于用“眼见之实”去核对“偏听之辞”,有意识地重视和寻求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信息;其次要深入到群体中去,与群体中的成员广泛接触,并重点加强与群体中有典型化、代表性的成员的沟通,不断地检索验证原来刻板印象中与现实相悖的信息,最终克服刻板印象的负面影响而获得准确的认知与评判。

刻板效应在科举评价中的表现十分突出。由于长时间对科举评价的负性强化作用,将科举时代及后科举时代对科举的消极认识及评价固化,即便新的更加客观的研究结论不断涌现,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大众的固有认知。如科举制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所以罪大恶极;李白、杜甫等未考上说明科举不能选拔真才;科举制是统治者愚民的产物;八股文是蠢笨的产物;科举制度是统治阶层内部的选拔;皇帝经常凭个人好恶随意决定及第名次;科举造成中国科技落后,考试作弊说明科举制度黑暗;科举考试不公平;妇女无权参考所以不平等;科举导致官场腐败等认识^[3],在普通民众间以讹传讹,依然具有较稳固的大众认识基础,具有一定普遍性。也就是这些认识与评判的存在将科举制“妖魔化”。当仔细考究对科举制的每一个刻板认识,就会很容易推翻其评判的论据,从而推翻其结论。但是若要彻底改变针对科举制的刻板效应,则必须遵从矫正刻板效应的路径,首先要揭示刻板性认识得以存在的与现实认识相悖的信息基础,其次应注重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关于科举制的正面信息,反复强化,用以时日,方可逐渐消除科举评价中的刻板效应。

2. 错觉关联。错觉是人们观察物体时,由于物体受到形、光、色的干扰,加上人们的生理、心理原因而误认物象,会产生与实际不符的判断性的视觉误差。错觉关联也称假想性联系,则是指当个体所期望的两个变量间存在着关系时,人们会高估存在关系的程度,或在实际上事物间不存在关系时认为有着某

种关系。错觉关联是个体在判断事物间关系时容易出现的认知归因偏差,出现错觉关联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对认识对象的充分了解,在很少占有甚至不占有认知对象相关信息的前提下,极其主观地、带有臆想性的认知行为。在此情形下形成的对事物的认识显然是不客观的。

错觉关联表现在科举评价中,主要表现在认识和分析科举制的相关关系时,容易妄加联系,随意判断,从而歪曲真相的归因行为。八股文、孔乙己、范进、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科举废止、科举为封建统治阶级选拔官员、封建社会的官本位及官场腐败等这些为社会大众耳熟能详、容易获得的信息往往会影响人们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和判断。由于人们对封建社会的消极面认识可谓根深蒂固,而科举制度又是封建社会时期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由此人们在认识及评价科举制度时容易将科举制度与封建社会的一切腐朽落寞方面联系起来,似是而非、一相情愿、想当然地形成一些推论,有让科举制度为封建社会的一切腐朽方面“担当责任”的趋势。封建社会的官本位、官场腐败、妇女无权参与科考、中国社会落后等与科举制或许存在一定关系,但谁是谁非,因果关系究竟如何,需要将科举制度放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系统、客观、深入地分析,方可得出正确结论。而如果因果颠倒,本末倒置,是无法客观评判科举制的诸种关系的。

科举制度使得社会身份不再世袭,为封建社会各阶层间的人员流动提供了条件。科举制度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贫苦农民家的孩子可以靠勤奋读书改变自己 and 家庭的命运,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从而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从历史发展观点来看,科举制相对于奴隶制社会的世卿世禄的选官制度和封建社会前期的九品官人制确是历史上的惊人进步,科举制为封建统治阶级选拔官吏、安邦治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余秋雨认为,“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势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得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持着机会。”由此不可否认,科举取士的确是封建时代所可

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好形式和途径,是最大程度上吸引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中下层人士加入国家政治行列的最优制度。^[4]由此看来,关于科举制导致中国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等判断显然是本末倒置,是认知的错觉关联,是不正确的结论。

3. 晕轮效应。晕轮效应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于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的。他认为,个体对人或事物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容易从局部出发,扩散而得出整体印象,也即常常以偏概全。如一个人如果被标明是好的,他就会被一种积极肯定的光环笼罩,并被赋予一切都好的品质;如果一个人被标明是坏的,他就被一种消极否定的光环所笼罩,并被认为具有各种坏品质。这就好象刮风天气前夜月亮周围出现的圆环(月晕),其实圆环只不过是月亮光的扩大化而已。据此,桑戴克为这一心理现象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晕轮效应”,也称作“光环作用”。^[5]从认知角度,晕轮效应仅仅抓住并根据事物的个别特征,而对事物的本质或全部特征下结论,是很片面的。晕轮效应的形成与我们知觉特征的整体性有关。我们在知觉客观事物时,并不是对知觉对象的个别属性或部分孤立地进行感知的,而总是倾向于把具有不同属性、不同部分的对象知觉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因为知觉对象的各种属性和部分是有机地联系成一个复合刺激物的。譬如,我们闭着眼睛,只闻到苹果的气味,或只摸到苹果的形状,我们头脑中就形成了有关苹果的完整印象,因为经验为我们弥补了苹果的其他特征,如颜色(绿中透红)、滋味(甜的)、触摸感(光滑的),等等。由于知觉整体性作用,我们知觉客观事物就能迅速而明了,“窥一斑而见全豹”,用不着逐一地知觉每个个别属性了。但是,这其中就埋下以偏概全而直觉错误的潜在风险。有时我们抓住的事物的个别特征并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可我们却仍习惯于个别推及一般、由部分推及整体,势必牵强附会地误推出其他特征。随意抓注某个或好或坏的特征就断言这个人或是完美无缺,或是一无是处,都犯了片面性的错误。

科举评价中的晕轮效应主要表现为由于科举制度存在客观弊端而遮掩了其固有的客观价值,在评价时以偏概全,歪曲这一制度的实际意义与作用。作

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 科举制度并非完美无缺的,定然存在一些不足。“科举制既没有十九世纪以前一些西方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二十世纪许多中国人说的那么坏。”^[6]在有关科举的文章中,我们经常看到“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不当表述,也经常看到因科举制度一些方面的不足而彻底否定科举的言论,也有一些评论者将批判封建社会的思维惯性与消极情绪扩散迁移至对科举制度的认识评价,所谓以点带面、以偏概全,错误显而易见。

客观评析 科举制度在一些时期的内容与考试形式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八股文体所束缚,导致许多应考者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了人才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才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清政府为了强化统治地位,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最终被迫废止。

但是,我们也不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应该看到,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与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科举制度对西方的考试制度也产生影响,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

阁”。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超过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的知识份子,这对知识的普及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7]

从正反两个方面认识科举制度,它与其他任何制度一样,都有正反两面性。而若只取其一面大加评断,无论其结论如何,都难以逃脱陷入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局面。出现晕轮效应也在情理之中。

总括以上三类科举评价中的社会归因偏差,存有一些共同之处。首先,有关科举制度的信息缺乏是导致各种归因偏差的共同原因。由于不了解科举制度的真实面目,或者似是而非,在评价时,自然而然的会捕风捉影,随心所欲。其次,评价者的学科背景、评价立场、依据的标准各异是导致评价不一的核心原因。基于对科举制度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的评价者往往对科举制度认识更深刻,评价更审慎,更客观;而对科举制度研究不深甚或没有多少研究的学者,对这一制度的评价更“大胆”,观点更“醒目”,却不一定准确客观。纵观各种关于科举制度的偏差性归因观点,往往是由后者发出的。由此,占有充分的有关科举制度的信息量、全面深入的研究是规避科举评价中归因偏差的重要前提。

三、科举评价中社会归因偏差的矫正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它的影响遍及西方,贯通古今。而对这一制度的不当认识及评价极其不利于我们客观、正确地评价历史,认识我国的传统文化,不利于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将科举制度“妖魔化”,不利于我们研究发现考试规律,不利于现代社会各种考试改革。矫正社会中存在的关于科举制度的偏差性归因观点,应从以下三个角度切入。

(一)基于文化自觉、文化寻根意识,充分重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保护,客观合理地认识评价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诸如科举制度这样的传统优秀

文化,走出“都是传统文化惹的祸”的错误认识、思想与情感误区。文化自觉是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放眼全球,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动辄将自己国家、民族的过去无情批判、全盘否定。作为一项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固然有其不可逾越的局限性,但是,科举制度毕竟在中国历史上实施1300之久,它如此强大的历史穿越力以及纵贯古今中外的广泛影响力很值得我们研究,它为我们提供的历史漫长、体系完整、内容广泛、资源丰富的考试研究样本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所没有的。由此,面对这样一项重要的制度,尊重历史,还原真相,揭示规律,是我们不可推诿的选择与责任。

(二)“不研究科举的人多觉得科举很坏,而研究科举的人往往发现它并不太坏”^[8]。因此,应重视并加强对科举制度的全面、深度研究,进一步揭示尚不为人所知的科举内容,从而为人们全面正确认识科举制度提供更多的信息参照。这也是矫正科举评价中归因偏差的根本举措。各种围绕科举制度的偏差性认识与归因有着比较广泛的大众基础,如果说遍存于民间的饭后茶余的有关科举的闲谈碎语只是民众娱乐的话题,无伤大雅,那刊登于公开媒体刊物,甚至出现于学者专著、演讲中的针对科举制的常识性错误认识和臆想则对公众舆论是一种误导,不利于矫正公众的刻板认识。

(三)科举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揭示考试规律、还原历史真相,之二是影响大众对科举的认识评价。

所以,应基于科举制度的专学研究,利用网络、报刊等现代媒体将其成果大众化、通俗化,帮助社会大众再认科举制度,从根本上影响并改变他们对科举制度的认识与评价。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关科举制度的研究资料日渐丰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有关科举的学术活动逐渐增多。这一局面对于深化科举研究、促进学术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如此丰富的科举制度的信息资源只是被少数学者所占有,就不足以影响更多人群的观点。从社会认知归因偏差理论视角,要矫正个体的偏差性认识,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要在原有认识基础上注入新的信息,权威的、持续的、有一定强度的信息输入是个体改变原有认识和判断的重要前提。由此,应将专业的科举知识通俗化、普及化,以让更多人群科学、客观地了解科举制度,逐渐从根本上矫正存在于科举评价中的各种偏差。

参考文献:

- [1] 张亚群. 科举评价:标准、视野与影响[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05(5).
- [2] 胡中锋. 教育评价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3-4.
- [3][8] 刘海峰. 为科举正名[J]. 厦门大学学报, 2010(3).
- [4] 许静. 中国科举制度的利弊及影响探讨[J]. 现代商贸工业, 2010(6).
- [5] <http://baike.baidu.com/view/485.htm>.
- [6] 刘海峰. 为科举制平反[J]. 书屋, 2005(1).
- [7]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84.htm>.

(责任编辑:罗立祝)

Deviation of Social Attribution in the Evalu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Its Correction

Li Xiongying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people pass different judgements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hich lasts from the period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o the post imperial examination era whe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s abolis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iation theory of social attribution, the effect of stereotype, illusion correlation and halo effect in the evalu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re the deep reasons to lead to the monsteriz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Cultural consciousness, emphasis on study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spread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formation are the fundamental measures to correct the deviation of the attribution in the evalu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Keywords: the evalu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ocial attribution, deviation, correction